

齐家文化研究(上)

张 忠 培

(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

全 文 目 次

- 一 皇娘娘台的分段
- 二 大何庄的分段
- 三 秦魏家南基地分段
- 四 秦魏家北基地分段
- 五 分期与源流
- 六 社会发展阶段

考古文化分期,是探讨考古文化源流、关系及社会制度诸问题的前题。在分析齐家文化源流、关系及社会制度之前,必须先对它的分期有一个较清楚、准确的了解。

大量考古材料证明,考古文化的演进,是由文化因素的量变逐步进入质变的过程。考古文化分期,是人们对考古文化演变过程中的质变阶段的认识。要抓准质变,先应弄清楚量变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村落与墓地的兴废,或处在文化进程中的量变阶段,或在一、二个环节中的质变阶段,很少见到一村落地墓地,尤其是前者经历了一考古文化兴衰的全过程。因此,考古学认识一考古文化演进的全过程,以及要了解它的地方性变体在进程中的变化,必须研究相当数量的村落与墓地。基于这一认识,在探讨齐家文化分期之前,先应逐一地对迄今发现的齐家文化的主要材料,即几处墓地作些探讨,在此基础上对它作分期的研究。即使这一研究程序的设想是科学的,但它也只能使我们的认识接近所研究的资料可能体现的客观实际。这道理自不待言。

为了把考古文化“分期”,和下面将要讨论的诸墓地、遗址兴衰过程中的阶段性变化区分开来,暂把后者称为“段”。需要说明的,墓地的“段”和文化的“期”有的可能吻合,为了客观地表述这一认识过程,仍不可先将两者混淆起来。

一 皇娘娘台的分段

皇娘娘台曾发掘四次,前三次发掘材料未能全面发表¹⁾,第四次发掘材料发表得较全²⁾。这里对第四次发掘材料作些分析(以下简称《报告》)。第四次发掘的有房址、灰坑和墓葬,以墓葬

1)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2)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1 期

为主。根据《报告》公布的平面图¹⁾,知有如下十组叠压或打破关系²⁾:

(1) M75→M64、71→F8; (2) M84→M85、88→M86; (3) M72→M73; (4) M57→M61; (5) M69→M74; (6) M80→M82→M81; (7) M52→M51; (8) M48→M62; (9) M56→H62→M60; (10) M27、30→H44→M29。

这十组遗存,从《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墓葬登记表》³⁾来看,前八组中作为对子的墓葬,有的未出器物,有的只出玉铲、石璧、石珠,未出陶器,有的虽都出陶器,因类别不同而难以进行比较,均不能据此作分段的研究。仅 9、10 两组提供了探讨分段的材料。H62、H44 未公布器物,现将这两组墓葬出土的陶器列成表一。

表一 M27、30、56、29、60 出土器物表

墓号	泥 质 红 (灰) 陶 (A)										夹 砂 红(灰) 褐 陶 (B)				
	双大耳罐	双耳折肩罐	豆	单耳罐	侈口曲领罐	碗	尊	双耳罐	双小耳罐	壶	单耳罐	双小耳罐	扁耳罐	碗	直口罐
27	II	II	I*	II					II	II*					
30	II2	II2	II	II6	A*	A*	II4	I、II*	II4、IV2	I	B	IV2 II2、II3、IV4	B*		B
56				I、II2											
29	III2	II		II3							I	II、IV		R*	B2
60	III			II							I				

说明: 1. A、B 分别代表泥质红(灰)陶和夹砂红(灰)褐陶的未分式别或式别不明的器物。

2. 罗马字代表式别,阿拉伯字代表件数,未注明者为 1 件。

3. * 代表器物在墓地中只出 1 件。

M27、M30 的层位均晚于 M29。前两墓随葬而可作比较的泥质红(灰)陶 I 豆及 II 壶,仅见于 M27,泥质红(灰)陶 IV 双小耳罐,除 M30 出土的这二件外,只在 M82 见过一件,即使依这些器物的式别而估定两墓早晚的话,对确认其它墓葬编年无甚补益。鉴于 M27 及 M30 和被它们打破的 M29 都出土夹砂红(灰)褐陶 IV 双小耳罐,不仅可基本认定只在 M30 出现的夹砂红(灰)褐陶 I 双小耳罐,是晚于 M29 而新出现的器形,而且还可提出它用于随葬的时间,或许可能晚于 M27 这一需要进一步求证的设想。因 M30 和 M27 不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使眼下对这一设想难于作出取舍。暂定这两墓同期。

M29 出的泥质红(灰)陶 III 双大耳罐,型式有别于 M30、27 出的同类器物。M30 新出现了 I 式夹砂红(灰)褐陶双小耳罐。可认为 M29 早于 M30、27。M60 随葬的三件器物,均未

1)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 4 期。该文图三,即《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遗迹平面图》中,少数墓葬未填墓号,或填错墓号。本文用的材料是请张学正同志查明,并改正过来的。特此致谢。

2) “→”具叠压或打破含义。因灰坑、房屋中出土的材料发表的极少,显然不能据此研究分段。故纯属此类遗存的叠压或打破关系,暂不列入。

3)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 4 期。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

超出 M29 出土器物的型式范围,可认定 M60 的年代同于 M29。和 M60 比较,在层位关系上晚于它的 M56,新出现了 AI 单耳罐,故可定 M56 晚于 M60。考虑 M56 也晚于被 M30、27 打破的 M29,暂设定它和 M30、27 同时。

M29、M60 是以 AIII 双大耳罐为特征,把随葬这种器物的 M37、40、52、55、59、87 等六座墓葬的年代,估定和 M29、60 同时。将这些墓葬称为 M29 组。

M27、30、56 诸墓以随葬 AII 双大耳罐、AI 单耳罐及 BI 双小耳罐而和 M29 组相区别,将凡出其中一种器物,而随葬陶器共生关系又不和 M29 组相抵触的 M32、48、67、68、76、83、88 等七座墓葬的年代,推定和 M27、30、56 同时,将它们称为 M27 组。

经上述分组后, M29 组新增加了 AI 双耳折肩罐、AI 尊、BII 豆和 BII 单耳罐¹⁾。可把凡出这其中一种器物,而同这种器物共生的陶器基本上和 M29 组陶器组合相同,又区别于 M27 组陶器组合的墓葬,归入 M29 组。这样, M29 组又增加 M42、47、65、73 四座墓葬。M65 被 M27 组的 M88 打破,为认定 BII 单耳罐是 M29 组的特征器物及 M29 组早于 M27 组,再一次提供了地层根据。

同时, M27 组的标准器物也增加了 AI 侈口双耳罐、AI 双小耳罐及 BI 侈口罐。而且,和 M29 组比较,现还可把先前在探讨具有层位关系的墓葬年代时,因无法类比或仅见于 M27、30 的 AI 豆、A 侈口曲领罐、AI 及 AII 双耳罐和 AIV 双小耳罐,也认为是 M27 组自有的特征性器物。按上述扩充 M29 组墓葬数量的原则,也应将 M33、57 放在 M27 组。

M38、46、54、82 四座墓出土的陶器,兼有 M29 组和 M27 组的标准器物,暂称之为

表二 M29、38、27 组随葬陶器表

墓 组	泥 质 红 (灰) 陶 (A)									夹 砂 红 (灰) 褐 陶 (B)				
	双大耳罐	双耳折肩罐	豆	单耳罐	侈口曲领罐	侈口双耳罐	尊	双耳罐	双小耳罐	双大耳罐	单耳罐	侈口罐	双小耳罐	豆
M27	II6	II6	II、II1	II3、II8	A1	I1	II3	I3、II1	I1、II2、IV1		B1	I3	I5、II2、IV5	II1
M28	I1	II1、II2	II1	II2			II2	I1	IV1		I2、II3	I1	I2、II1、IV1、V1、V11	
M29	III8	II1、II4	II1	II9			I1、II4			B1	I3、II6	II1	II3、IV6、V1	II2

说明: 1 A、B 分别代表泥质红(灰)陶和夹砂粗红(灰)褐陶未分式别的陶器。

2. 罗马字代表式别,阿拉伯字代表件数。

3. M29 组计入后面将要说明的归入该组的 M51。

1) M30 出夹砂红(灰)褐陶单耳罐,未标明式别。除 M55、87 外, M29 组其它随葬 AIII 双大耳罐的六座墓葬,或共出 BI 单耳罐,或共出 BII 单耳罐。同时,这两式单耳罐的绳纹均饰于肩腹之间,而和 M27 组特有的 BI 侈口罐及 BI 双小耳罐的绳纹,均自颈通到底的装饰作风,是颇有区别的,故可认为 BI、BII 单耳罐是 M29 组具有特征的器物。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1 期

M38 组。

现将这三组墓随葬陶器型式统计成表二。

M38 组随葬陶器,除 AI 双大耳罐外,其它器形均不出 M29 和 M27 组随葬陶器范围。其年代或介于 M29 组和 M27 组之间,或可晚到 M27 组。这三组墓葬有相当多的器物的型式相同,或虽有区别,但变化不大,故知其间的年代上的衔接是比较紧密的。

《报告》编定的 AIII、AII 与 AI 式双大耳罐, AI 与 AII 式单耳罐, BII 式与 BIII 式豆的形制,彼此似乎存在较大的区别。它们各自虽都是同类的器物,却不可都归为同型。故其形制的差异,难以被认为是同型器物不同时间的变异。但这表中同类器物形制的差异,对从年代上确定组别无疑是自有其功能的。

下面,讨论那些存在着叠压或打破关系而未出陶器,或虽出陶器但难以断定组别的墓葬的年代问题。这类墓葬有 M61、62、69、71、80、81、85、86, 和 M51、64、72、74、75 及 M84 等十四座墓葬。M51 出土 M29 组和 M27 组共有的 AII 单耳罐、BIV 双小耳罐,是被 M29 组打破的一座墓葬,故定为 M29 组。M72 打破 M29 组的 M73, M61、62、86 分别被 M27 组的 M57、48、88 打破或叠压,这些墓葬的年代当不能早于 M29 组,或晚于 M27 组。打破 M82 的 M80, 和被 M82 打破的 M81, 分别不能早于 M82 所属的 M38 组, 和晚于 M38 组。至于 M69、71、64、74、75、85 和 M84 和前述组别的关系,都难以确定。

M34、35、36、39、41、44、49、50、53、58、66、77、79 均未出陶器, M31、43、45、63、70、78 的随葬陶器均非前述分组的标准器,且它们和已定组别的墓葬又不存在层位关系,故无法讨论它们的组别。

前三次发掘的 M24 出土的双耳瓶、陶盆、陶豆和侈口圆肩罐¹⁾, 分别同于 AII 式双大耳罐、AII 式尊、BII 式豆及 AII 式壶。M24 的年代当在 M27 组。

最后,讨论 F8 的年代问题。据《报告》关于 F8 的文字叙述及图四的说明,知在室内发现的残整陶、石(骨)器相当丰富,分别为十一件和九件。《报告》只介绍了敲砸器(4)、骨锥(16)、双大耳罐(6、14)、敛口罐(5)、双耳折腹罐(9)、双耳罐(15)和鬲足(11)八件器物,同时附有插图或照片的陶器只有三件,使我们难以全面了解 F8 的文化面貌、特征。《报告》将 F8 出土的两件双大耳罐及二件双耳折腹罐²⁾均单独编式,表明它们和墓葬出土的陶器不同。F8:14 双大耳罐的形制,和甘肃临洮杨家咀采集的一件相同。区别仅是前者的颈部因轮制而留有凹弦纹七周,

1)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 2 期。图版伍, 1;图版肆, 1、2;图版陆, 5。

2) 《报告》在介绍陶器时,说“双耳折腹罐二件”,具体描述了 F8:9 一件。查墓葬登记表知墓葬未出这种器物。F6 平面图说明该房屋出双耳折腹罐两件。编号分别为 8、9。所以估计另一件双耳折腹罐也出自 F8;即编号 8 的那件。因和 F8:9 形制一致,故《报告》未作介绍。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

后者颈部饰有十余条彩绘圆周纹¹⁾。两者腹部的绳纹,是相同的,而和皇娘娘台诸墓随葬陶器上的绳纹,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同时,被《报告》归为同一种的两件双耳罐(F8:15、M67:3),从《报告》对它们的文字描写看,也是不相同的。然而,F8出土的两件双大耳罐却表明它和同地墓葬的文化性质一样,也是齐家文化的遗存。因此,它们出土器物上的区别,只能被认为是同一文化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变异。

F8被M64、71、75直接或间接叠压或打破。M71未随葬陶器;M75仅随葬一件三组共见的AII式单耳罐;M64出土的陶器也缺乏组别特征,除了三组习见的AII式单耳罐及BIV式双小耳罐外,还出土一件在墓地仅见的BI式豆。考虑其组合,当把M64的年代,估定在墓地范围之内。这深一层的意思是说,F8在层位上早于墓地的某一时期。

前已指出,墓地三组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F8出土器物和墓地随葬器物存在较大差别,同时,估计到上述层位关系,应把F8的年代推定在墓地之前。这样,可把皇娘娘台的遗存分为自早至晚四段:一段,以F8为代表;二段,M29组;三段,M38组;四段,M27组。

二 大何庄的分段

《报告》将发掘的遗存分为两层²⁾,并指出它们的一些差别。近年,负责发掘及编写报告的谢端琚同志,在《论大何庄与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分期》³⁾一文中,据区分的两个地层将大何庄遗存明确地分为两期,推进了齐家文化分期的研究。

从《报告》的文字叙述和公布的TA和T57、58堆积剖面图看,知大何庄的堆积并不是单一的,而存在着区别。TA黄褐土层(2A)下,压着M37、38两座墓葬,和这两墓打破的灰褐土层(2B),不见于T57、58;相反,T57、58在红褐土层(2B)下,压着一层深灰土(3A)和一薄层黄土(3B),这薄层黄土下压着M89、90两座墓葬及其打破的浅灰土层(3C)。TA的红褐土层(2C)却直接压着浅灰土层(3)。大何庄堆积的这些区别,应引起注意。

从地层上看,打破灰褐土(2B)的M37、38,和被灰褐土压着而打破红褐土(2C)的M41-43,当属于不同层位,《报告》的《图三,探沟A、E、F遗迹分布图》,也是将它们分别标明为“第二层上部墓葬”和“第二层下部墓葬”的,但《报告》内的《大何庄齐家文化墓葬登记表》却统之为二层。从层位看,压着墓葬的地层当晚于墓葬,被墓葬打破的地层当早于墓葬。例如,TA的M37、38和2A、2B的层位关系应是2B→⁴⁾M37、38→2A,同样,这一探沟的M75和2C、3的层位关系当是3→M75→2C。因此,不能把处于这种层位关系的墓葬,简单地归入那一地层,例如,不能把M37归为2C层,也不便把它算作3层的单位。

1) 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6期,图版叁,7。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2期。

3) 谢端琚:《论大何庄与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分期》,《考古》1980年3期。

4) “→”表示自早至晚的层位或年代顺序,其左侧单位较早,右侧单位较晚。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1 期

如我们从其包含的遗物观察,上述作为例证的两组层位关系的诸遗存的年代顺序,可能出现较之层位关系更为复杂的多种年代顺序情况: 2B→M37、M38→2A; 2B、M37、M38→2A; 2B→M37、M38、2A; 2B、M37→M38→2A。3→M75→2C; 3→M75、2C; 3、M75→2C, 等等。

可见,从层位和出土遗物考察遗存的年代关系,既可能得出两者一致而相吻合的认识,在一些情况下,又往往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形。正确地断定遗存的年代关系,必须从诸遗存的层位关系出发,对不同单位出土的遗物进行类型学分析,才可能得出符合事实的认识。

《报告》公布的地层出土遗物,均未标明层位,不便讨论它们的年代关系。《报告》中的《图三探沟 A、E、F 遗迹分布图》表述的诸遗存单位的层位关系,提供了讨论这些遗存年代关系的基础。

现将出土陶器的诸单位的情况列成表三。

表三 A、E、F 探沟内单位出土器物表

单位	层位	圆底罐	单耳罐	双大耳罐	豆	侈口罐	双耳罐
M37	2 上					BII、BIII	
M40	2 上			AII	AIII	BII	
M42	2 下			AII		BII	
M43	2 下			AI		BIV	
M66	3			AI		BI	
M74	3		AIII				
M75	3			AI			BI
M76	3						BII
M79	3	AII		AI			
F7	高领折肩罐*						

*《报告》指出,在 F7“灶址周围,发现有 10 余件完整或可复原的碗、盆、罐和器盖等日用陶器。……在一件粗陶侈口罐(F7:10, 出灶址东边)内,还保存着小半罐被火烧焦了的粟粒。另外,在居住面东边与第 7 号柱洞之间,发现铜匕一件”。遗憾的是,限于当时出版报告的条件,《报告》只发表了 F7:10 罐内的粟粒和铜匕。后来,在《论大何庄与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分期》(《考古》1980 年 3 期)一文,公布了 F7 出的一件高领折肩罐。

表中陶器的式别和单位的层位,均依《报告》。

M42 和 M43 两墓均“位于第二层下部”,然两墓出土器物的式别截然不同。M42 随葬的两件器物的式别,均在“第二层上部”的 M40 随葬器物式别范围之内。因此, M42 的年代当不出 M40 的年代界限。M37 出土的两件侈口罐的形制,区别于层位上早于它的 M43 及 M66 两墓随葬的同类器物。其中一件 BII 侈口罐见于 M40、42 两墓。这样,当把它的年代估定与 M40、42 二墓约同时。所以,可把 M37、40、42 归为年代上基本同时的一组墓葬,称之

为 M40 组。

M43、66、74、75、76 及 M79 六座墓葬的层位,均早于 M37、40,后五座墓的层位也都早于 M42。M43、66、75 和 M79 出土的双大耳罐均为 AI 式,和 M40 组的同类器物相异。这样,应把这四墓的年代估定早于 M40 组,并认为它们的年代约略同时。M74、76 两墓出土器物,既区别于 M40 组,又不同于上述四座墓葬。我们从可能估定它们的年代的唯一条件,即层位关系来看,自然当把它们定在 M40 组之前,并且,还只能把这两墓的年代,估计在 M43、66、75、79 四座墓葬的时间。现在,可把这六座墓编为约略同时的一组,暂称为 M66 组。

从表三中,可以明白 M40 组和 M66 组的随葬器物截然不同。前者以 AII 双大耳罐、AIII 豆及 BII、BIII 侈口罐为其基本陶器组合;后者以 AI 双大耳罐、BI、BIV 侈口罐、AII 圜底罐、AIII 单耳罐和 BI、BII 双耳罐,构成另一种基本陶器组合。

把出 M40 组陶器组合界限内两件以上的诸墓葬,或随葬这一组合中任一件陶器,但与这件陶器共生的陶器式别,虽超出 M40 组陶器组合,而未进入 M66 组陶器组合界限内诸墓,归入 M40 组。M56 随葬 BIII 侈口罐、AI 单耳罐、BIII 侈口罐属 M40 组陶器组合范围, AI 单耳罐超出 M40 组陶器组合界限,但未进入 M66 组陶器组合范围,故可把 M56 归进 M40 组。这样,在 M40 组陶器组合中增加了 AI 单耳罐。依此,把 M48(出 AI 及 BI 单耳罐)和继而将 M16(出 BI 单耳罐及 AI 圜底罐)两墓列入 M40 组后,这组陶器组合又新增加 BI 单耳罐及 AI 圜底罐。M60 随葬 AII 双大耳罐、BII 及 BV 侈口罐。因前两件式别是在 M40 组陶器组合范围内,故可将 M60 列入 M40 组。该墓出土的 BV 侈口罐,在 M58 中是和 M66 组陶器组合范围内的 AI 双大耳罐及 BI 双耳罐共生,所以,虽可把 M60 归进 M40 组,却不便把 BV 侈口罐归入 M40 组陶器组合。这样, M40 组的墓葬,包括原有的及新增加的计有八座(M16、37、40、42、48、56、60 及 M69)。

依据上述墓葬并组的原则,和在并组基础上依次串连而扩充陶器组合的办法,可将 M1、4、7、13、17、18、20、22、35、47、58、61、62、70、81、86、90 等十七座墓葬,并入 M66 组。这样,加上原来的六座墓葬,这组墓葬总数达二十三座。在陶器组合方面,新增加有和 M40 组陶器组合相区别的 AIII 圜底罐、AI 侈口罐、A 高领深腹罐、AII、BII、BIII 单耳罐、A 高领双耳罐、AI、AII 豆和 B 小口罐等十种新器形。

在明确 M40 和 M66 这两组陶器组合之后,可把那些随葬陶器含有两组陶器组合的墓葬,例如: M57 既出 AII 双大耳罐,又出 BI 侈口罐; M89 出 AI 双大耳罐、A 高领双耳罐,又出 AII 双大耳罐及 BII 侈口罐,等等这类墓葬,单独编为一组,称为 M89 组。属这组的墓葬有 M6、24、27、34、36、39、53、54、55、57、63、87、88、89 共计十四座。

我们不能根据随葬陶器的情况,讨论剩下未出陶器的三十七座墓葬的分组,或许能从它们在墓地的位置,来估定它们和前述墓组的关系。

要探讨这一问题,先要弄清楚已编组的墓葬的年代与其在墓地中的位置,是否存在我们能

认识到的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一) 发掘面积约为 236 平方米的 T55—60 及 B、C、D、G 探沟内的遗存分布图没有发表。这范围内分布十七座墓葬,其中已明确组别的有十三座,未定组的只有四座。定组墓葬和未定组墓葬的比例为 3.25:1。已公布遗存分布图的发掘面积约 1147 平方米的区域内,有墓葬六十五座。其中定组的墓葬三十二座,未定组的墓葬三十三座,两者的比例是 0.97:1。这些情况表明,未公布遗存分布图的发掘区内的墓葬的密集程度,远远高于已公布遗存分布图的发掘区。因此,从已编组墓葬的年代与位置的联系,去寻求墓葬排列规律,并据此估定未定组墓葬的组别,未公布遗存分布图的发掘区的条件,远远优于公布遗存分布图的发掘区。同时,后者的墓葬总的来说却是比较分散的,加之,已定组的墓葬在墓葬总数中占的比例很小,是难以探求已定组墓葬的排列规律的。

(二) 要了解墓葬的排列规律,除应具备基本上能确定墓葬早晚年代这一条件外,所研究的墓葬还需处在同一层位。《报告》在谈到地层堆积时指出:“揭去现代耕土层(第一层)后即见遗址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上层即第二层,主要是黄褐土和红褐土堆积,但黄褐土层并不普遍;下层即第三层,以浅灰土为主,并夹有其它厚薄不等的土层堆积”¹⁾,可见,上、下两层,基本上各自均有一个以上的地层堆积。从公布的地层剖面图看,情况亦然²⁾。在《报告》确定的二、三层有可能再细分若干地层的情况下,不能把这里二层或三层的墓葬,视为同一层位的遗存。这样,就失去了探讨墓葬排列规律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探沟 A、E、F 遗迹分布图》,基本上是按《报告》说的“小层”公布的墓葬分布图。遗憾的是,这里明确组别的墓葬,第三层的全是 M66 组,二层上部的又都是 M40 组,同层墓葬的组别缺乏差异,难以据墓葬的组别及位置,了解它们的排列顺序。而第二层下部墓葬可确定组别的只有两座,即 M43 属 M66 组, M42 定为 M40 组,按年代,这两座墓葬是依东北—西南排列。这是孤例,我们不能据此作出墓地排列顺序是如这两墓所显示的情况这样的论断。可见,现有的材料及认识,不能确定已定组别的墓葬的排列顺序。因此,就失去了估定未编组墓葬的组别的根据。

《报告》基本上未发表出于遗迹的器物,同时,地层出土的遗物,均未注明层次。《论大何庄与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分期》依上、下两层补充的地层出土器物,也只是《报告》公布器物的一小部分。同时,大何庄地层相当复杂,如前所述,是难以上、下两层所能概括的。这样,要探讨地层及遗迹年代的划分,是非常困难的。不过, F7、2 均被属于 M66 组的墓葬叠压或打破,层位年代当不晚于 M66 组。F7 出土的高领折肩罐和 M66 组的 M90 随葬的高领双耳罐,虽存在有无双耳之分³⁾,从整体形态观之,仍可归为一类器物。这两件器物有较大的区别,前者肩腹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 2 期 31 页。

2) 同 1) 之 33 页,图五。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图二五,5,《考古学报》1974 年 2 期。谢端琚:《论大何庄与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分期》图二,14,《考古》1980 年 3 期。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

折角明显,可谓折肩;后者较瘦长,肩腹之间无明显折角,可谓溜肩。这就为把 F7 的年代定在 M66 组之前,提供了器物类型学的根据。

综上所述,可把大何庄遗存分为早晚四段:一段,以 F7 为代表;二段, M66 组;三段, M89 组;四段, M40 组。为清晰起见,现将这四段包含的器物列成表四。

表四 一至四段陶器类型比较

器型 段别	泥 质 红 陶 (A)									夹砂粗红褐陶 (B)			
	钵	圈底罐	侈的罐	侈口长颈罐	高领深腹罐	单耳罐	双大耳罐	高领双耳罐	豆	小口罐	侈口罐	单耳罐	双耳罐
四	I	I				I	II		III		II, III, V	I	
三	I, III, VI		II, III	A		IV	I, II	A	I, II, III		I, II, III, IV, V		I
二		II, III	I		A	II, III	I	A	I, II	B	I, IV, V	II, III	I, II
一	高 领 折 肩 罐												

说明: A、B 为未分式别的器形。

三 秦魏家南墓地分段

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¹⁾,《报告》将其区分为南、北两墓地。前者位于 T1—19 及 C、E—i 发掘区内,后者在 T51—55 发掘区内。两者应区分开来的原因,除《报告》说的它们分布区域及死者头向有所不同外,同时,如后文所述,两墓地的年代也有区别。

两墓地所在区域的遗存种类及地层结构,存在着差异。南墓地遗存种类较多,有墓葬、“石圆圈”及窖穴,层位结构复杂。据 TC 南壁剖面图所示遗存的层位的先后顺序应是:④→③→H42→②→M97、78、10→①。而从《报告》图三²⁾见到的南墓地遗存叠压或打破关系,有的显得更加复杂,如:

(1) M41→M53→H51→H50, M53→H49, M40→H51。

(2) M9→M89→H43, M19、21→H43。

(3) M31→M74, M68→M74、75→H49, M75→H22。

(4) H46→F1。

似乎不能将这里的墓葬“石圆圈”和窖穴简单地归入被它们打破的第二层或第三层。

同时,凡和墓葬存在着直接层位关系的窖穴,均被墓葬叠压或打破,甚至还隔了一个层次,可见,概言之,窖穴早于墓地。然而,窖穴之间也存在着叠压或打破关系,如: H36→H46→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 年 2 期。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 年 2 期 58 页。

41; H26—→H55、H31—→H27, 等等, 难以认为这些窖穴是同一时期的遗存。因出于窖穴的材料发表的太少, 不能确认绝大多数窖穴的年代。

从发表的材料看, H1 及 H64 的年代最早。H1 出土了一件绳纹罐形甗 (H1:1), 和一只内带泥球、外壁饰着陶甗那样绳纹的甗足下部 (H1:3)¹⁾。H64 出一件绳纹甗 (H64:1)²⁾, 和 H1:3 甗的绳纹相同。这几件器物当属同时期的制品。

1978 年秋, 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试掘灵台桥村遗址³⁾。这里的 H4 出土陶器最多, 已发表的有带把罐形甗二、甗一、高领深腹罐三、单把罐一、双耳罐一、盆二和碗一, 共计十一件。我在 1980 年初写的《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中提出, 带把罐形甗起始的年代, 早于带把罐形鬲, 并认为客省庄文化当单独地存在以罐形甗为代表的时期⁴⁾。当时未见桥村材料。桥村 H4 出土了那么多陶器, 不易寻到完整的或难以复原的甗就有二件, 唯不见鬲, 当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一相当典型的共生单位, 为上述拙著, 提供了一个层位根据。H4 的这两件罐形甗, 形制完全一致。除带把外, 其它特点均同于秦魏家的 H1:1 甗。其中 H4:91 也饰有和 H1:1 一样的绳纹。它们袋足内底也保留着像 H1:3 那样的泥球。这说明它们的制法相同, 和客省庄一样, 也是用泥条盘筑法制作的。同时也应指出, H64:1 陶甗的形态, 完全同于桥村 H4:32 陶甗⁵⁾。两者的区别仅是前者为绳纹, 后者为篮纹。虽然, 不能认为以 H1 为代表的秦魏家遗存的文化性质, 和以桥村 H4 为代表的遗存相同, 但其文化面貌相似的程度, 却使我们认为它们之间必定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往。交往又需以它们的年代同时为前题, 所以, 它们是并存的联系紧密的两种遗存。

秦魏家 H68:3 和 M89:1 两件双大耳罐, 形制相似, 《报告》把它们编为同一式。仔细看来, 还是有区别的。《报告》把它们同时作为标本介绍出来, 显然也是看到了两者的形制差异。H68:3 双大耳罐较 M89:1 显得粗肥, 两耳上端都穿有在 M89:1 不见的长方形孔。耳上装饰长方形孔完全同于皇娘娘台 M38:12 那件, 但 H68:3 的器形比 M38:12 矮胖许多。同时, 它明显地区别于桥村 H4:27 双耳红陶罐。类型上, 虽不能将 H68:3 和皇娘娘台 II、III 式双大耳罐归为一型, 但体形的肥瘦情况, 两者却有些近似。和它的形制基本雷同的是皇娘娘台 M24 出土的双耳瓶⁶⁾。H68 的年代, 当早于 M89, 晚于以 H1 为代表的遗存, 而和皇娘娘台 M27 组(即四段)相同。

可见, 这里的窖穴至少可分为两个时期: 其一, 以 H1 为代表的遗存; 其二, 以 H68 为代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图版拾壹, 12、11,《考古学报》1975 年 2 期。

2) 同 1), 图版拾壹, 7。

3) 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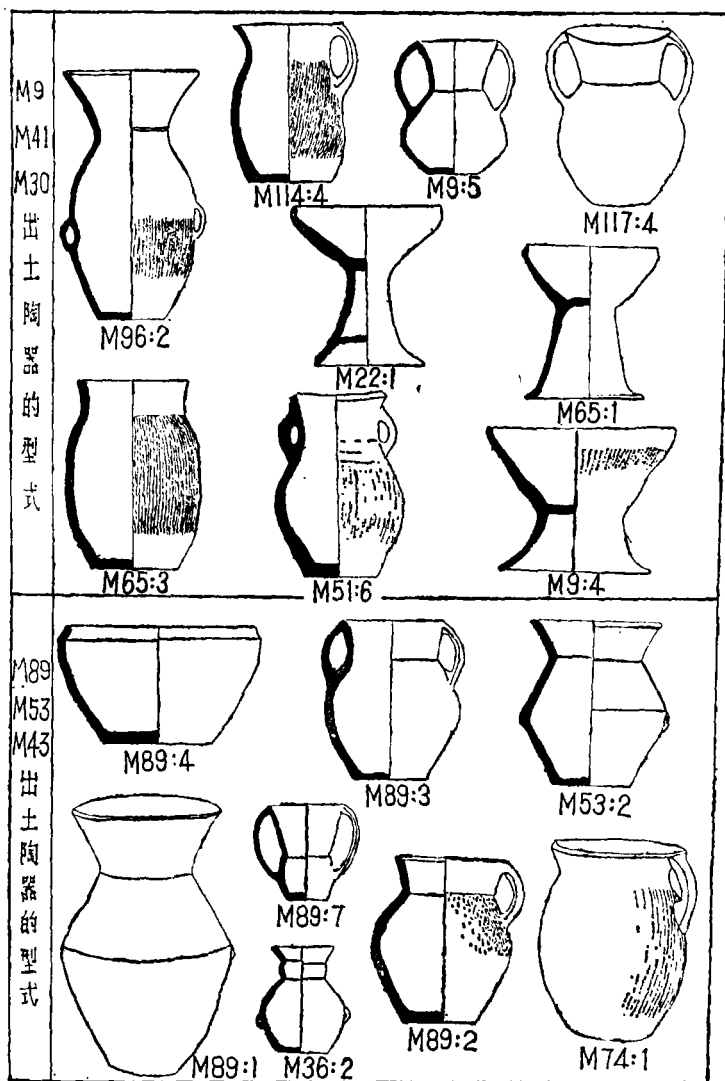
4)《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 年 4 期。关于以罐形甗为代表的时期, 是归入客省庄文化? 还是另外命名为它种文化? 还可研究。

5) 同 3), 图版叁, 1。

6)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图版伍, 2,《考古学报》1960 年 2 期。

表的遗存。前者早于后者。这里先将 H1 为代表的遗存和 H68 为代表的遗存分别定为秦魏家南墓地一段和二段。

“三层”的 M36、43、53、74、75、89、98、109¹⁾ 共八座墓葬。层位上早于“二层”排列有序的九十九座墓葬。同时,出土的器物又有区别,《报告》认为“它们之间有早晚关系,即下层墓葬要比上层早些”²⁾。这无疑是正确的。



图一 秦魏家 M43、53、89、30、41、9 出土陶器比较图

1) M109 未出器物,从地层考虑,暂把它和其余七座墓葬视为同期。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 年 2 期 68 页。

从“三层”墓葬和直接叠压其上的 M9、30、41 诸墓随葬陶器比较¹⁾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矮肥,同时,颈、腹转角较为明显。“三层”墓随葬陶器的风格,接近于皇娘娘台墓葬出土的陶器。M9、M30、41 诸墓的陶器,则和皇娘娘台随葬的陶器作风相去甚远(图一)。

M36 出土的带把罐形鬲的年代,显然晚于 H1:1 罐形甗²⁾,同时,鉴于前述关于 H68 年代早于 M89 的估计,当把“三层”八座墓葬定为秦魏家南墓地三段。

秦魏家南墓地“二层”墓葬一〇一座,均无打破关系,其中九十九座³⁾排列有序,整齐地分为六排,形成完整的墓地。层位关系未提供探讨这墓地诸墓葬早晚年代的线索。大何庄遗存在秦魏家遗存之东北,相距仅 500 米,两者均属齐家文化。故从大何庄墓地研究中提出的确定段别的标准器物,无疑可作为探讨秦魏家南墓地分段的重要依据。

高领双耳罐和双大耳罐,是大何庄划分段别的两种重要的标准器物,同时,它们又是秦魏家南墓地常见的器物。让我们先从两地这二种器物的对比分析入手,以探寻研究秦魏家南墓地分段的起步点。

在讨论大何庄遗存分段时,我们已指出这里的高领折肩罐(F7:3)和高领双耳罐,是同类型的先后不同阶段的两种器物形态。F7:3 高领折肩罐的肩、颈折角明显,通高和腹径的比例为 1.7:1;《报告》作为高领双耳罐标本的 M90:4 肩、颈已不见明显的折角,通高和腹径的比例为 2:1。总之,后者较前者瘦长,似乎使人感到归向流线型形态是这种器物演变的趋势。未标明层位的 TA:35 高领折肩罐的肩颈及肩腹的转角程度,和通高与腹径的比例情况(1.64:1)均同 F7:3 接近,两者的年代亦当基本相同。秦魏家 III 式高领双耳罐的颈肩及肩腹转角,和肥瘦情形,介于大何庄 F7:3 及 TA:35 和 M90 之间,而比较接近于前者。同地的 IV 式高领双耳罐的形态,则和大何庄 M90:4 高领双耳罐雷同。根据上述,可以推知秦魏家 III 式高领双耳罐的年代,应在大何庄 F7:3、TA:35 高领折肩罐和 M90:4 高领双耳罐之间,IV 式的年代,则晚于同地的 III 式。

大何庄高领双耳罐只见于出 I 式双大耳罐(四例)或 I、II 式共生(一例)的墓葬;同时,凡单出 II 式双大耳罐的墓葬,则不出高领双耳罐。可见,高领双耳罐的年代,是和 I 式双大耳罐相始终的。

大何庄的 I 式双大耳罐早于 II 式。其间形态上的区别,是后者比前者的腹部更为鼓出而下移,底径和腹径最大处的比例缩小,颈部伸长,和颈肩转角趋向和缓。两者形态的演化趋势,和高领双耳(折肩)罐的演进方向相同。

秦魏家的 V 式双大耳罐和大何庄 II 式双大耳罐雷同。IV 式双大耳罐比大何庄 I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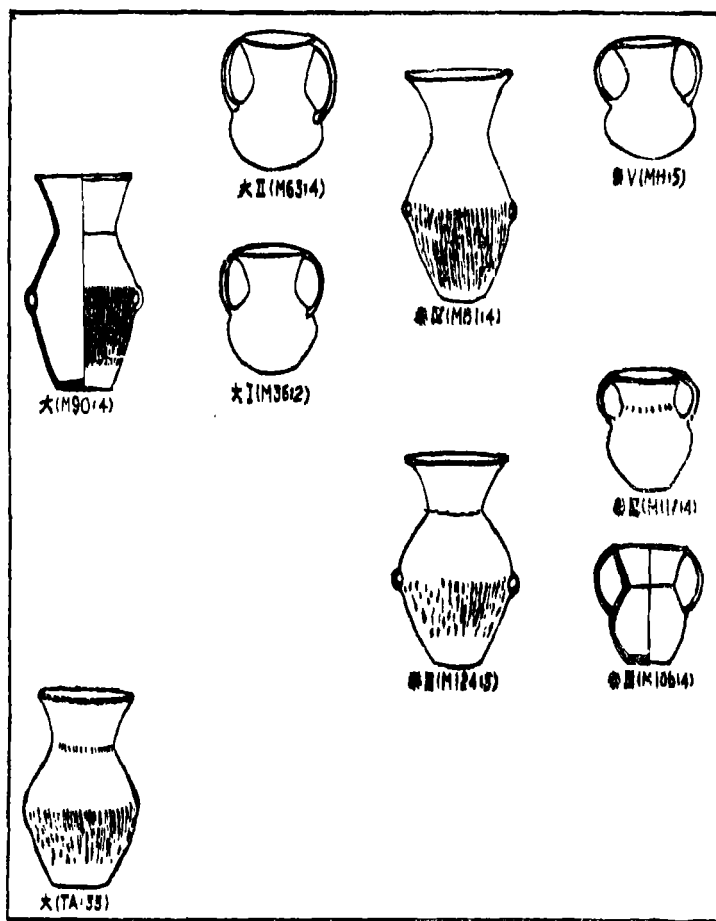
1) 直接压在“三层”墓上的墓葬五座。其中 M31 及 M68 未随葬陶器。

2) 张忠培:《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 年 4 期。

3) 另两座墓葬的位置,在这九十九座墓葬组成的墓地北面,TA 探沟之内。它们的头向及层位完全一致,是有联系的。从布局上看,这两墓却在那九十九座墓葬组成的墓地之外。

双大耳罐的最大腹径处偏上一些,底径和腹径最大处的比例较大,颈部较短,和颈肩转角明显许多。按大何庄 I、II 式双大耳罐形态的演进趋向,当把秦魏家 IV 式双大耳罐出现的年代,定在大何庄 I 式双大耳罐之前。同时,出于同样的道理,也应将秦魏家 III 式双大耳罐出现的年代,推定早于同地的 IV 式双大耳罐。

现将秦魏家和大何庄两地的高领双耳(折肩)罐和双大耳罐形态及年代对比关系,排成图二。



图二 大何庄和皇娘娘台高领双耳(折肩)罐、双大耳罐的年代关系图

明确了秦魏家高领双耳罐和双大耳罐的形态变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之后,试通过两种器形的式别共生关系,作探讨秦魏家南墓地分段的尝试。

南墓地出 IV 式双大耳罐的墓葬十九座。就其和高领双耳罐的关系来看,除 M10、12、19、21、47、56、61、83、100 等九座墓葬未出高领双耳罐外,在出高领双耳罐的十座墓葬中, M24、41、60、65、69、84、88、9 等八座墓葬为 III 式,仅 M52 及 M103 两墓是 IV 式。相反,在十三座

出 V 式双大耳罐的墓葬中,也按墓和高领双耳罐的共生关系来说,除去 M1、27、54、57 等四座未随葬高领双耳罐外, M6、13、42、44、81 等五座墓是和 IV 式共生, M9、20、90、95 四座则同出 III 式高领双耳罐。可见, M9 是唯一的一座共含 IV、V 两式双大耳罐的墓葬。据前面排定的双大耳罐式别的年代关系,可把 M9 视为用 V 式双大耳罐替代 IV 式双大耳罐作为随葬用品的过渡阶段。

同时,在用 IV 式高领双耳罐随葬的墓葬中, M8、11、39 三座墓葬出 II 式双大耳罐。反之,出 III 式高领双耳罐的墓葬中,则未见一座墓葬出 II 式双大耳罐。其次,在出 II 式双大耳罐的 M40 中,同出 V 式高领双耳罐,以及在随葬 IV 式高领双耳罐的 M33 中,也见到 VII 式双大耳罐。据 V 式高领双耳罐及 VII 式双大耳罐形态判断,不能把这两墓的现象视为偶然的孤例。这两种器物的出现年代,当在 III 式高领双耳罐及 IV 式双大耳罐之后。最后,出 III 式高领双耳罐的 M82,同时随葬 III 式双大耳罐,而在出 IV 式高领双耳罐的墓葬中,却没有出 III 式双大耳罐的。这也反映了 III 式双大耳罐作为随葬品的年代,不会晚到用 IV 式高领双耳罐随葬的时候。

这样,可以把 III、IV 式双大耳罐和 III 式高领双耳罐共生的墓葬,或只出 III 式高领双耳罐而不见双大耳罐的墓葬,以及不用高领双耳罐仅以 IV 式双大耳罐随葬的墓葬,定为秦魏家南墓地四段;将 V 式或 II 式双大耳罐和 IV 式高领双耳罐共生的墓葬,单出 IV 式高领双耳罐或 V 式 (II 式) 双大耳罐的墓葬,或 II 式双大耳罐及 V 式高领双耳罐共生的墓葬,以及 IV 式高领双耳罐、VII 式双大耳罐伴出的墓葬,定为南墓地六段;少数几座 IV 式或 V 式双大耳罐和 IV 式或 III 式高领双耳罐共生的墓葬的年代,或在四、六段之间,或可晚到六段,虽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这里先暂把它们从其余已定段别的墓葬区分开来,列为秦魏家南墓地第五段。

依上述分段标准, M10、12、17、19、21、23、24、30、34、37、41、47、56、60、61、65、69、82、83、84、86、88、96、100、104、115 计二十六座墓葬,当属四段; M9、20、52、90、95、103 计六座墓葬,属五段; M1、3、6、8、11、13、22、27、29、33、35、38、39、40、42、44、54、55、57、58、67、78、80、81、87 计二十五座墓葬,可定在六段。这样,可确定段别的墓葬共五十七座。在一〇一座墓葬中,有二十六座墓葬未出陶器。已定段别的墓葬,占随葬陶器墓总数的 76%。它说明以上述标准识别墓葬的段别,具有相当广泛的效能。

为弄清四至六段的关系,以及探讨随葬陶器而未确定段别的墓葬的年代,有必要通过对各段墓葬出土陶器进行类型比较,以筛选、提炼出识别段别的新的标准器形。为此,现将四至六段墓葬随葬陶器类型排成表五。

可见,这三段之间有相当一部分器物的形态缺乏变化。五段墓葬出土器类的 77% 不见于四段,见于六段,或四、六两段都有发现。只有 I 式双小耳罐、IV 式单小耳罐和 IV 式双耳罐是四、六段没有的,但它们分别只在一墓中见过一次,难以认为它们是确认五段的标准器物。

张忠培: 齐文化研究(上)

表五 秦魏家南墓地四至六段墓葬随葬陶器类型表

段别	杯	碗	盆	敞口罐	折腹罐	瓶	单耳罐	双小耳罐	双大耳罐	高领双耳罐	豆	侈口罐	长颈罐	单小耳罐	双耳罐
六	II	I、II、III、IV	IV	II、III	III		II、III、V、VII		II V、VII	IV、V	II、III、V、VI、VII	VII、VIII		I	III
五		IV		III				I	IV、V	III、IV	II、V	III、VI		IV	IV
四		III	III	I		II	III、IV、V、VIII		III、IV	III	II、III、V、VII	III、IV、VI、IX	II	I、III	III

同时,四、六段墓葬出土而相互区别的某些器物,如 II 式杯, II 式碗, I、II 式敞口罐, IV、VII、VIII 式单耳罐, VI 式豆, VIII、IX 式侈口罐, III 式单小耳罐和 II 式长颈罐,也都只在一墓中发现过一次,并且在北墓地亦未见到这类器物¹⁾,先不说把它们作为区分段别的标准器物的或然率太小,即使认为它们是分段的标准器物,那对于认识随葬陶器而未分段的墓葬的段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样,六段出土的 II 式单耳罐,除有耳外,形态基本上同于四段的 I 式敞口罐。因此,我们难以认为这些器物是确立四、六段墓葬的标尺。这样,一方面使我们见到四至六段之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除了上述划分段别的标准器物外,又使我们可以将 II 式瓶及 III、IV 式侈口罐,和 III 式敞口罐及 III 式折腹罐,分别增为四段和六段的标准器物。

据此,应把 M45、91、51、85、112 和 M49、62、99,分别定为四段和六段。

四 秦魏家北墓地分段

北墓地二十九座墓葬,均无打破、叠压关系,位于同一层位。只能据南墓地分段的认识,结合这里随葬陶器的组合关系,以探讨这处墓地诸墓葬的年代早晚问题。

高领双耳罐和双大耳罐的式别及组合关系,是我们认识南墓地墓葬段别的主要依据。这两种器物在北墓地的式别及组合的基本情况如下。

1. 这里墓葬总数约76%的二十二座墓葬,都随葬高领双耳罐。其中随葬 III 式高领双耳罐的墓葬十九座,占随葬高领双耳罐墓葬总数的 86%,出 IV 式或 I 式高领双耳罐的墓葬,分别仅为二座或一座。

2. 在出 III 式高领双耳罐的十九座墓葬中,有十八座伴出双大耳罐。其中随葬 III 式或 IV 式双大耳罐的墓葬,各为五座,出 III、IV 式两种双大耳罐和 IV、VI 两式双大耳罐的墓葬,分别为六座和二座。

3. 二座出 IV 式高领双耳罐的墓葬,伴出的双大耳罐的式别,是不相同的。一座为 III 式,另一座为 IV 式。

4. 随葬 I 式高领双耳罐的墓葬,出土的双大耳罐是 III、IV 两式。

1) II 式长颈罐二件,一件出自南墓地 M115,一件是在北墓地 M117 中发现的,据发表的插图及照片看,它们的形态是有区别的。

可见,北墓地较广泛地用 III 式双大耳罐随葬,新见 VI 式双大耳罐及 I 式高领双耳罐,罕见 V 式双大耳罐,以及高领双耳罐和双大耳罐式别组合的变化,是它和南墓地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别。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南墓地分段的认识,来解决北墓地的分段。

上述基本情况表明,北墓地诸墓葬随葬器物的一个重要因素,即高领双耳罐的式别变异不大,而和它结成伙伴的双大耳罐的式别,却存在引人注目的差异。例如,同是随葬 III 式高领双耳罐的十八座墓(M125、119、108、107、132、113、110、122、105、123、128、130、117、127、137、136、120、124),伴出的双大耳罐的式别,就存在如下四种情形:III; III、IV; IV; IV、VI。因此,探讨不同式别的双大耳罐和双大耳罐的不同的式别组合是否存在着早晚,是研究北墓地可否分段的契机。

北墓地十八座随葬 III 式高领双耳罐的墓葬,有的伴出单一的 III 式或 IV 式双大耳罐,有的伴出 III、IV 两式或 IV、VI 两式双大耳罐。由于这批墓葬出土的双大耳罐的式别及其组合存在着差异,可否通过它们探讨 III、IV、VI 式双大耳罐的年代关系。

因为这里的双大耳罐只存在 III、IV 和 IV、VI 两种组合,可知 III、VI 两式双大耳罐在年代关系上不可能挨近,而 IV、VI 两式双大耳罐的年代则当接近。据此,应把单出 IV 式双大耳罐墓葬的年代,排在出上述两种组合的双大耳罐的墓葬之间,即共出 III、IV 两式双大耳罐的一侧,而把单出 III 式双大耳罐的墓葬摆在这类墓葬的另一侧。这十八座墓葬没有提出确定 III、IV、VI 式双大耳罐年代关系的材料,但它所显示的逻辑规定人们只能在如下两种年代序列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1. III (M107、108、119、125、132) → III、IV (105、110、113、122、123、128) → IV (M117、127、130、136、137) → IV、VI (M120、124),即双大耳罐式别的年代序列为 III → IV → VI。

2. 上述颠倒过来的年代序列。

可见,要在这两种年代序列间作出抉择,需要求证的关键是 III 与 IV 式或 III 与 VI 式双大耳罐任何一组的年代关系。

应当指出,在讨论南墓地的时候,已据大何庄双大耳罐的演进趋向,以及南墓地与大何庄双大耳罐的形态比较,说明了 III 式双大耳罐早于 IV 式双大耳罐。但限于南墓地只有 M82 出 III 式双大耳罐,当时,我们在确定墓葬段别时,却据同它伴出的 III 式高领双耳罐,将 M82 的年代定在以 III 式高领双耳罐及 IV 式双大耳罐共生为特征的四段,而未进一步讨论 III、IV 两式双大耳罐的年代。

北墓地随葬的双大耳罐的式别,有 III、IV、V 及 VI 四种;它们的式别组合形式也只有 III、IV, IV、V 和 IV、VI 三种。V 式双大耳罐晚于 IV 式双大耳罐,以及 IV、V 两式双大耳罐共生的墓葬晚于单出 IV 式双大耳罐的墓葬,而早于单出 V 式双大耳罐的墓葬,是在研究南墓地分段时已认识的事实。

我们知道,秦魏家没有 III、V 两式双大耳罐共生于一墓葬的例子,仅在北墓地见到 M105、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

106、113、114、110、122、123、128 共八座墓葬均是 III、IV 两式双大耳罐伴出的情况,而在北墓地 M135 及南墓地 M9 看到 IV、V 式双大耳罐共存的现象,在已知 V 式双大耳罐晚于同类器物的 IV 式的情况下,这些不同式别的双大耳罐伴存现象所显示的逻辑,表明 IV 式双大耳罐的使用年代,当延续到 V 式双大耳罐出现的时候,III、IV 两式双大耳罐曾在一段时间内共存,但 III 式双大耳罐的使用年代,不能延续到出现 V 式双大耳罐的时期。换句话说,即这些式别双大耳罐出现的年代顺序只能是 III 式最早, V 式最晚, IV 式居中。

然而,要肯定 III 式双大耳罐早于同类器物的 IV 式,还需对 M126 的情况作些分析。

M126 是秦魏家唯一同时用 III 式双大耳罐及 IV 式高领双耳罐随葬的墓葬。南墓地的情况已经证实: IV 式双大耳罐与 III 式高领双耳罐共生的墓葬,早于 V 式双大耳罐同 IV 式高领双耳罐伴出的墓葬。可否据 M126 情况,修正这一认识,或者对这一认识作些补充说明。如把 M126 的双大耳罐和高领双耳罐的式别组合,放在北墓地含这两种器物的墓葬中进行排比,即可发现不仅难以修正或补充以往任何一点认识,而且也找不到任何一种方案,排通它们的年代关系。比如依双大耳罐 III→IV→VI 式,或 VI→IV→III 式的年代序列,去排比高领双耳罐的年代顺序,见到的是 III (M107、108、119、125、132 均 III 式双大耳罐)、IV (M126 III 式双大耳罐)→III (M105、110、113、122、123、128, M117、127、130、136、137, 和 M120、124 十三座墓葬,伴出双大耳罐的式别依次是 III、IV→IV→IV、VI)→IV (M134, VI 式双大耳罐)¹⁾的顺序,或者是同此截然相反的顺序;反之,依高领双耳罐 III→IV 或 IV→III 之年代序列,在排列双大耳罐时,遇到的是 III→III、IV→IV→IV、VI (前述随葬 III 式高领双耳罐的 M107 等十八座墓葬)→VI (M134, IV 式高领双耳罐), III (M126, IV 式高领双耳罐)或是 VI、IV→IV→IV、III→III (亦是 M107 等十八座墓葬的另一种排列)→VI (M134)、III (M126), 或者分别同这两种情形完全相反的顺序。可见,没有一条途径,使它们摆脱彼此排斥的矛盾而得到自拔。因此,不能依 M126 的情况,修正从研究南墓地以及本节分析双大耳罐式别时得出的认识。

这样,依据 III 式双大耳罐出现的年代早于同类器物 IV 式的认识,可把凡是未出 IV 式高领双耳罐,而分别随葬 III 式, III、IV 式和 IV 式双大耳罐的墓葬,定为北墓地的一段、二段和三段。定为一的是 M107、108、118、119、125、132 等六座墓葬,二段的是 M105、106、110、113、114、122、123、128 等八座墓葬,三段的墓葬则是 M117、121、127、130、131、133、136、137 等八座。

M120 及 M124 两墓均出 III 式高领双耳罐,与其伴出的是 IV、VI 两式双大耳罐,在

1) 《报告》墓葬登记表中的陶器式别,不少是与配有图版的叙述陶器的文字说明的式别不符的。例如 M134 双大耳罐 VI→IV(→右侧为文字说明的式别,左侧为登记表中的式别,下同)。M127 高领双耳罐 III→IV、M107 盆 VI→VI、M58 杯 II→I、M40 侈口罐 VIII→IX 和 M9 双耳罐 IV→VI, 等等,当是登记表排印之误,本文一律依叙述陶器的文字说明的式别作了校正。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1 期

M134 中, VI 式双大耳罐和 IV 式高领双耳罐共生。故 VI 式双大耳罐用作随葬器物的年代,可延至使用 IV 式高领双耳罐随葬的时候,它作为随葬器物的年代上限,可推到使用 III 式高领双耳罐随葬的时期,但不能早过使用 IV 式双大耳罐随葬的年代。这样看来,当把 M120、124、134 三墓的年代,估定为早不到三段,或至早和三段同时。

M135 是 IV、V 两式双大耳罐共存的一座墓葬。它的年代当和 M120、124、134 三墓约略同时。

M129 和 M138 未出分段的标准器物。M129 随葬 II 式陶瓶和 II 式单把罐形隔。前者仅见于定为一段的 M108, 后者去三足之后, 和二段的 M114 出土的 I 式单小耳罐(4) 的形态近似。M138 随葬 III 式高领双耳罐。故虽不能确指这两墓的具体段别, 但可估计它们的年代亦当在北墓地三段之内。

现将三段墓葬的随葬陶器的共存关系排成表六。

表六 秦魏家北墓地三段陶器比较表

段别	碗	盆	敞口罐	折腹罐	瓶	单耳罐	双耳小罐	双大耳罐	高领双耳罐	豆	侈口罐	长颈罐	单小耳罐
三	III3、IV2	III1		I1		II1、III1		IV10、VI4	III7、IV1	II1	III6、IV4、VI3	II1	II1
二	I1、III2、IV1			III1		III1、V2		III8、IV8	I1、III6	I1	I1、II1、III2、IV2、VI2		I1
一	III1	IV1	III1	I1	I2、II1	III1	III1	III6	III6	II1	IV1、VI3		III1

说明: 1. 罗马字为器物式别, 阿拉伯字为件数。2. M120、124、134 统计在三段内。3. M126、129、135、138 未统计。

4. VI 式双大耳罐《报告》文字说明是 3 件, 墓葬登记表 M120、124 各出 1 件, M134 出 2 件, 共 4 件。

从上表可以看出, 北墓地三段陶器的一些器类式别形态的更替, 和主要器类的组合形式的变化, 显示出它们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同时, 上述更替、变化的渐进性, 和某些式别的器类贯穿三段的情况, 却显示三段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总之, 北墓地是经历了依次渐进的三段时间内形成的一处墓地。